

试析国家安全观的衍变

胡 文 秀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新乡 河南 453007)

[作者简介] 胡文秀(1979-), 女, 山西太谷人,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问题的出现使传统安全观受到挑战, 冷战后时期的安全观出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安全观的结构性变革。新安全观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传统安全观由于其历史影响以及现实的冲突, 使得传统安全观仍将在国际安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关键词] 传统安全观; 新安全观; 均势安全; 集体安全; 合作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2-0195-06

冷战结束以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解体,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全球问题不断涌现, 其影响和解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 “溢出”效应不断加强, 这些使得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态势和国家之间合作的趋势不断增强。这对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提出了全新挑战, 新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本文将对安全观的变化以及安全战略的选择进行分析。

一、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在国际关系中, 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也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安全的思想, 《易经》中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经·系辞下》)《左传》中也有记载:“《书》曰,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到了近代, 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 国家间交往范围增大, 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使保障安全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关于安全的含义学者见仁见智, 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具有二元性, 较为普遍的、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是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冲突与合作》中的观点:“所谓安全, 从客观上来讲, 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 从主观上来讲, 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威胁的恐惧。”^[1](第 44 页)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 主观上不存在恐惧。所谓安全观, 是指“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力的认识, 是对其所处环境的判断, 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采取措施的政策宣示。”^[2](第 3 页)从概念来看, 安全观涉及安全利益、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等方面。近年来, 学界对安全观的研究层出不穷, 概念表述也不尽相同, 如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均势安全观、集体安全观、合作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本文将根据国家所受的威胁和所关注的利益, 将安全观分为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 而均势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安全观, 而仅仅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 是实现安全的一种手段。

二、传统安全观的代表性的观点

(一)传统安全观与现实主义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其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和无政府状态之下自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传统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1. 传统现实主义与均势安全。现实主义从人性恶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社会,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有争夺权力的私欲,正如霍布斯所说,“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采取一切方式保护自己,当怀疑别人有侵害自己的企图时,便先行攻击,因此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3](第 96 页)这种世界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就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即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样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并由此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和潜在的威胁^[4](第 7 页)。在传统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家之间是充满竞争和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安全是一种“零和”的博弈,国家维护生存与安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增强自身实力,另一种是削弱他国力量,后者的实施在后果上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维护安全。每个国家增强实力、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会增加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每一方都把自己的举措解释为防御性的,而把对方的行为解释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这种因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而导致的军备竞赛,就是国际体系的特征——安全困境,因而“安全困境”也成为传统安全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现实主义看来,既然国家间的冲突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各个国家就会选择“自助”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在各国无力主导国际社会时则会采取均势战略,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均势理论尽管备受争议,但其作为一种维护安全的模式曾屡次被采用,也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均势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以给一国带来一时的安宁,但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可能为国际社会维护短期的稳定,但不可能保护持久的和平。

2. 新现实主义与均势安全和霸权稳定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传统现实主义已无法解释国际社会已存在的和可能的合作,影响不断下降,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改变了过去从人性善恶的角度对国家行为的分析,注意到了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迈德尔·曼德尔鲍姆提出的,“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特征,而不是国家自身的特征”^[5](第 2 页)。与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冲突淡化合作不同,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沃尔兹就认为:“尽管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在谋求自我保存和增加其权力的过程中会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但国家关系未必就是因追求权力而导致冲突的单一模式,有时国家会选择合作而不是战争,因为冲突代价高昂,合作则有利于保持和平与发展”^[6](第 124 页)。但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并不否认均势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同时,新现实主义也注意到了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开始关注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派。在安全问题上,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提出了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结构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创,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的。吉尔平认为霸权能够带来稳定,“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护,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7](第 105 页)。在霸权国建立霸权体系时,国际体系由于霸权国有能力且有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而变得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体系稳定,历史上曾出现过“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经济实力超强的国家(或霸权国家)都试图通过建立霸权统治的方式来实现安全。但是,霸权国家是否是在真心实意维护和平?事实上,之所以建立霸权是因为“国际关系领域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追求权力的国家外表是追求均势,实际上是追求权力优势(superiority of power),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8](第 19 页)。可见,强国建立霸权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霸权国建立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了换取别国对其领

导地位的认可,一旦付出成本大于收益,霸权国就会停止公共产品的提供,使国际社会处于动荡状态。

(二)传统安全观的特征

传统安全观是一种“个体安全观”或“单边安全观”,在形成过程中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是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现实或潜在的对手来实现本国安全的一种理念,可以通过均势或霸权来实现。通过对传统安全观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安全观有如下的特点:首先,是以理性为出发点,认为国家是试图在无政府状态下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安全。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上升到国家就是国家之间充满着竞争和冲突,充满着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处于竞争敌对的状态,这样为确保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得以保持完整,军事实力就至关重要。其次,安全的主体和中心都是国家。安全主体是威胁指向的目标,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者”,“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维护存在和基本安全的国家”。再次是对安全性质的理解。传统安全理论认为由于国家间脆弱性和敏感性的依赖程度较低,危害影响有限,“内传”、“外溢”、“扩散”现象不明显,不同国家、部门和领域之间能够独善其身^[9](第52页)。因而安全是可以分离的,只要一国军事实力强大,本国的绝对安全就可以实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可以保障,经济、文化、个人安全也可以确保。

三、新安全观的缘起及代表性的观点

(一)新安全观的缘起及特点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传统安全观在逻辑和现实上都受到了挑战。首先,全球化的兴起使各国相互依存的态势明显,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经济领域的“非零和”博弈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其次,几十年的军备竞赛,苏联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通过不断扩充军备、增强自身实力并不能完全摆脱失败灭亡的命运。冷战之后,尽管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居于世界首位,仍未能抵御恐怖主义的袭击。全球化时代单边军事实力已无法确保一国的绝对安全,各国纷纷思索新的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再次,全球问题兴起,跨国性问题越来越突出:资源短缺,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破坏,走私贩毒,国家分裂,这些问题带有全球性,单靠一国已无法解决,必须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在这种状态下新安全观应运而生,这种新体现在:首先就安全主体而言,新安全观认为国家不再是安全的唯一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正在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重大政治问题和安全的进程中,并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行为,这样安全的主体就扩展到了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安全。其次就安全目标而言,传统安全观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求安全和权力的最大化,而新安全观则认为全球问题的出现,安全的目标有了丰富的内容,今天的国家仍然关心自己的军事安全,但他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富、艾滋病的蔓延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10](第12-17页)。这样,传统领域中的军事、政治安全不再独占鳌头,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这些“低级政治”领域获得了与“高级政治”同样重要的地位。再次就安全手段而言,传统安全观认为军事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有效手段,新安全观认为全球相互依存使合作变得有可能,使用军事追求安全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关注绝对得益才有可能更好地维护和平,因而合作是实现安全的基本手段。

综上可看出,新安全观已不再重点强调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安全,认为安全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统一,是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统一,是可以通过合作互信来实现的一种全新安全理念。在新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许多的理论都对其作过诠释,其中自由主义的合作和制度理念、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对新安全观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

(二)新安全观与自由主义

1. 理想主义与集体安全。理想主义是从人性善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理想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国家之间的利益也可以协调,之所以会

出现战争是因为国际社会中的制度的缺失。因此,从一开始理想主义所构建的安全就是制度性的,比如建立世界政府,通过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道德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安全。基于理想主义对人性和国家安全的建构,加之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均势安全无法维护国家安全,理想主义学者主张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体现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即由一批国家组建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国放弃使用武力并承诺采取共同行动,对破坏和平的国家采取经济甚至是军事制裁,以此来确保本国的安全。集体安全是人类所设计的安全机制中较为完善的一种,但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集合到占据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反对任何潜在的侵略者;(2)成员对于所要捍卫的安全必须有共有的安全观念;(3)成员之间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集体的共同利益^[11](第 533 页)。这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不符的。尽管集体安全有合作协调的性质,但是现实中各国实力不同,又缺乏社会权威,使得大国一致在这种安全模式实行中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从本质而言集体安全是大国主宰,小国陪衬。二战期间国联的失败就在于大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分歧,冷战期间联合国的不作为也是美苏两国利益存在分歧的结果。把集体安全作为对外战略选择的只能是世界性的大国,“一方面,它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的安全,需要集体安全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安全程度,即达到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集体安全需要其他大国的协作,只有大国间的协作才能确保集体安全的效果。”^[6](第 383 页)集体安全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是大国安全博弈的手段而已,有了合作的性质却打上了强权的烙印。

2. 新自由主义和制度安全。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时期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世界越来越连接成一体,每个国家都是链条上的一环,相互依存的增强意味着各国的利益相融,国家之间要同甘苦,共患难。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战争过时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8](第 17 页),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他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8](第 17 页)。同时,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军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新自由主义还注意到了国际行为主体多样化的现实,强调多渠道的联系,包括政府精英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等,这样多个行为体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在论及维护安全时新自由主义尤为强调制度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有理性的,会权衡行为的得失,相信遵守制度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基欧汉就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会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制度有助于进行互惠操作,降低交易成本,使承诺更可信。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三个内容:(1)加强政府实施自身承诺和监督别国的遵守协议的能力;(2)增强谈判各方之间信息和机会的交流;(3)维护国际协议的一致性^[6](第 156 页)。

(三)新安全观与建构主义和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学者也意识到安全观发生的变化,他们所倡导的安全观与以往安全观强调物质力量有所不同,主要聚焦于社会的建构而非安全的客观方面,强调规范、认同利益和知识在战略目标中减轻安全困境以及在安全互动中培养共有的意识^[12](第 22 页)。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事实,但通过互动可以构筑不同性质的文化。温特论证了三种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国家间关系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国家间关系互为竞争者的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国家间关系以朋友为特征的互助的康德文化。在建构主义看来,不同的文化会对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规范与认同会限制决策者可运用的手段,制约行为的选择,而且从功能上来看,国际规范不只是限制国家的行为,而是通过改变国家的认同,重新建构国家的利益,最终根据新的国家利益采取新的战略行为^[13](第 66 页)。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化”进程,内化为国内合法性规范,从而构建新的国家认同,影响、塑造国家的战略决策^[13](第 66 页)。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二战之前的法德是世仇,历史上德国三次入侵法国,但战后的残酷现实使法德意识到了要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和解合作,共同的利益和认同使法德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建构主义学者还认为安全不应该仅仅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也决不应孤立地看待一国安全,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克提出了“世界安全”的概念,试图质疑以国家安全定位的传统安全观。哥本哈根学派也提出安全主体并非只有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网络,“是一个行为主体相互竞争的领域”^[12](第 52 页)。建构主义主张通过建立“安全共同体”来实现和平,其

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安全共同体是国际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超越国际社会之上而未及世界共同体之最高境界的一种中间状态的社会形式;第二,安全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结构,其实质是成员国之间形成的集体认同和社会含义;第三,安全共同体不排除成员国的自身利益追求,安全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实在^[14](第48页)。

(四)合作安全:安全战略的一种理性尝试

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理论上不同程度地延伸和扩展了传统安全观的研究范围。在横向上,安全从军事和防务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反映了全球化的根本趋势;在纵向上,竭力突破国家安全本位的观点,将安全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人的安全和世界的安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和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安全都对新安全模式选择作了很好的诠释,但在实践过程中,其观点的实行还有一定的难度,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制度安全中的制度作为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能否平等地体现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国际社会现存的制度绝大多数体现的是大国利益。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的提出有重要的意义,实现了文化和认同对安全理论的回归,但其又是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因为在当今时代实力依然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实践。

合作安全的提出则是新安全观一次贴近现实的重要尝试。1990年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合作安全”的概念,此后众多学者和官员就合作安全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1)合作安全的基础是这一区域内的国家面临的共同危险,不仅是战争威胁,还包括诸如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全球问题;(2)合作安全诉诸的手段并不强调军事行动,而主要是通过成员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加强政治协调和对话,合作模式也比较广泛,可以是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可以是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也可以是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对话;(3)合作体制中的成员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4)合作安全模式强调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区域安全机制^[15](第3页)。合作安全强调对话性和渐进性,使这种安全模式更具活力,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建立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四、结 语

新安全观的提出为国家摆脱安全困境提出了对策,但是新安全观绝不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否定,而是在吸收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依据现在形势发展做出的进一步完善,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并未终结。首先,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强,全球问题不断涌现,蝴蝶效应日渐明显。事件相互激发会造成连锁反应,任其恶化、外溢会对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国家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的损害,因此合作已实属必要。顺应这一形势产生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和内容上都有了扩展,构筑了“平等、互利、合作、互信”的安全框架,这是新安全理论试图超越传统安全理论、跨越现实来解决国际社会“安全困境”的伟大尝试。但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并未改变,国际社会也未有世界性权威的出现,地区冲突、宗教冲突依然存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仍是各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新安全观在理论上和现实中还存在着困境^[16](第12-14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尽管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实现本土安全开始与国际社会合作,但其传统的寻求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一的和同盟的安全观仍存在,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始终考虑相对得益,这种冷战思维的延续对新安全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次,尽管提出了新安全观,各国也意识到了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安全,但由于国家实力、国家制度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同,各国所构想的新安全观也迥然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国内问题基本解决,主权领土不受威胁,他们所构想的安全观更多的是关注人权、环境、生态、科技等方面;而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有时还面临着大国的威胁,因而更多的还是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关注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独立。因此,短时期内对新安全观的具体内涵以及如何实现还难以完全达成共识,真正做到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兼容并蓄、平等合作还存在困难,“民主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仍将继续。

纵观安全观的发展,传统安全观一直占据国际社会主导地位,新安全观和合作安全观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它在安全主题、安全目标上都对传统安全观作了修正和完善,但是新安全观直到冷战结束才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其理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传统安全观的历史影响以及现实的冲突使得传统安全观仍将在国际安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参 考 文 献]

- [1] 苏长和. 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J]. 欧洲, 1997, (1).
- [2] 罗 援. 两种安全观念, 两种安全模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 (3).
- [3]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4] 王逸舟.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迈德尔·曼德尔鲍姆. 国家的命运——19 世纪和 20 世纪国家安全的追求[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 [6]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7]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杨光宇, 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 [8] 刘胜湘. 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 (3).
- [9] 吴志成, 朱丽丽. 当代安全观的嬗变[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 (3).
- [10] 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历史与理论[M].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 争权利, 求和平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12] 巴瑞·布赞, 等.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13] 子 杉. 国家的选择与安全: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5.
- [14] 刘 军. 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J]. 社会科学, 2002, (2).
- [15] 尹桂云. 均势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4).
- [16] 刘胜湘.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J]. 欧洲研究, 2004, (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View of State Security: Evolution

HU Wenxiu

(School of Law,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Biography: HU Wenxiu (1979-),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Law,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globalization and appearance of global issues, traditional state security view was challenged in the 1970s. After the cold war, structural change in state security viewpoint happened from traditional security view to new security view, meanwhile, security models also changed. The evolution of state security view shows traditional security view dominated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security view; new security view; balance of power; collective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